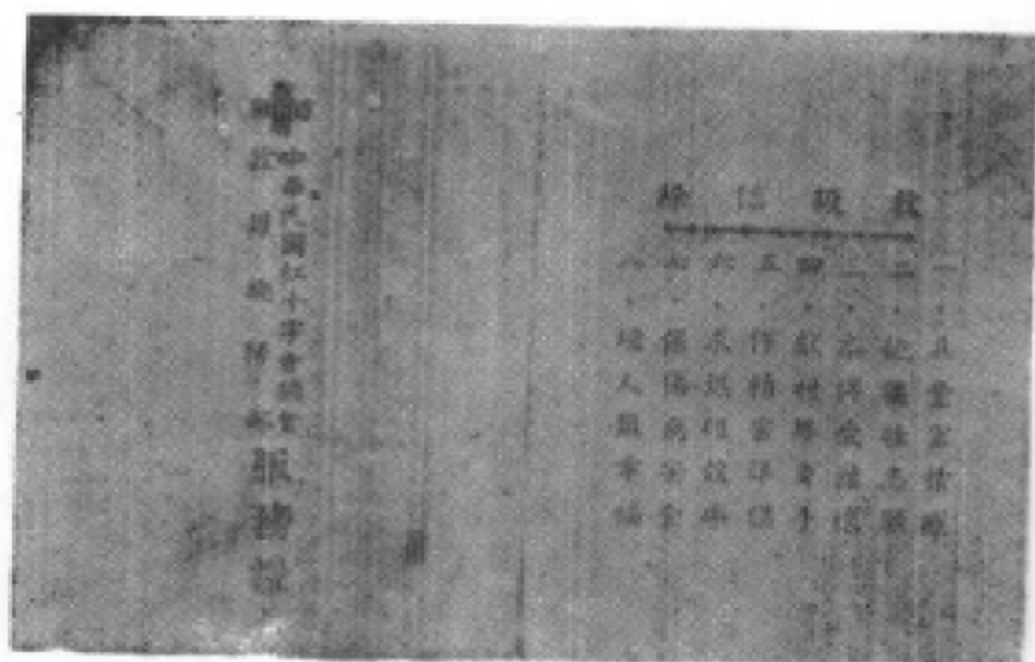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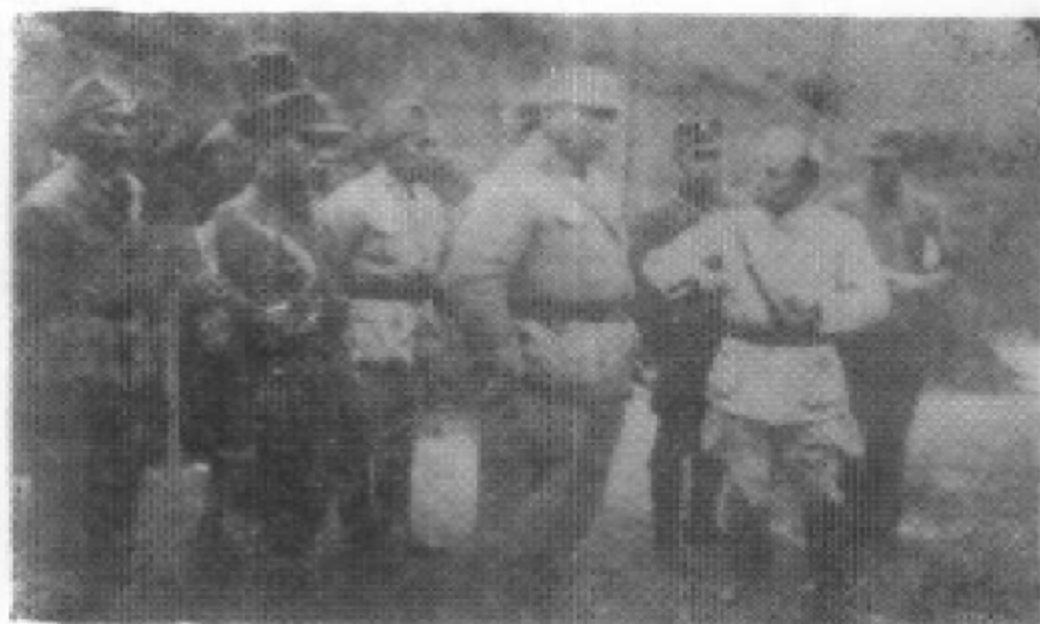




经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服务证



冯玉祥将军(中)视察贵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施正信(左一)林可胜(左四)过祖元(右二)等陪同视察



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右六）与在华
外籍医生合影于图云关（1941年）



外籍援华医生在图云关红会总部山间合影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先生



林可胜总队长（前排左三）与部份工作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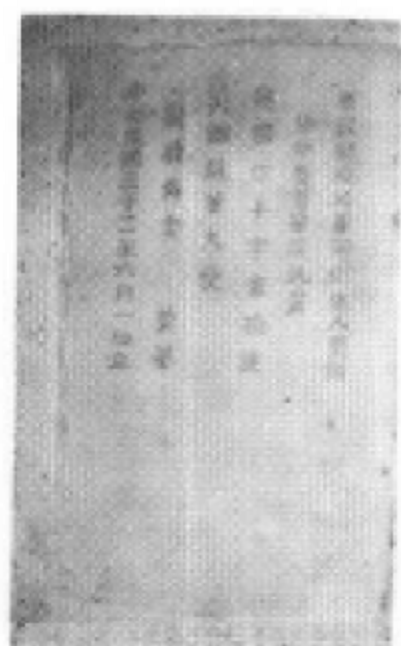


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药械材料库
职工宿舍等房屋（一九三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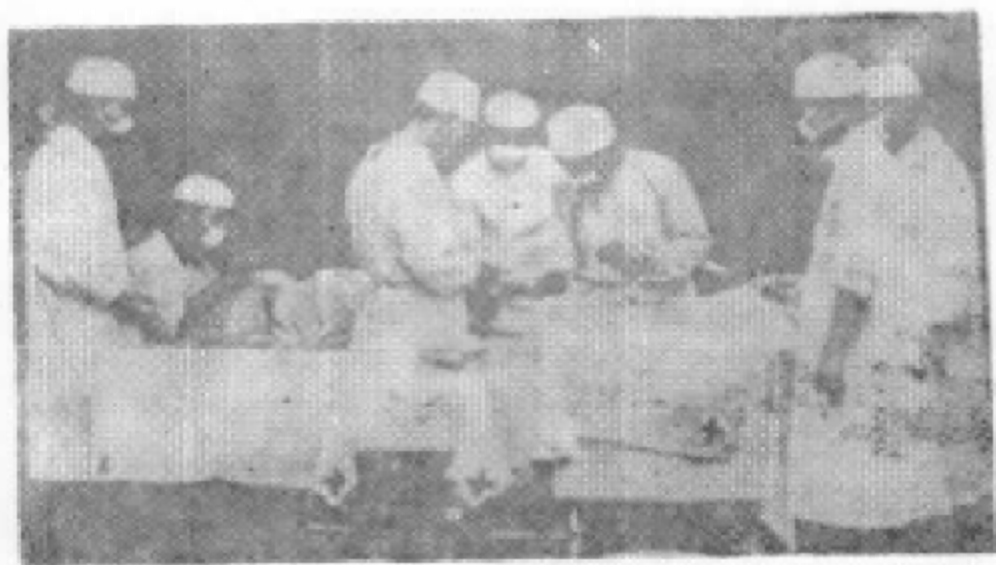
贵阳图云关上英国医生高田宜之墓

英国红十字会捐建的卫训所实习医院奠基石（一九四三年）



美国医药助学会捐建的卫训所实习医院奠基石（一九四三年）





1938年红会救护总队第35救护队在陕甘宁边区
做手术的情况。

35

目 录

回忆抗战时期党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	
.....郭绍兴 (3)	
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红会救护总队部.....	过祖源 (9)
抗战时期我在“红会”医疗队的一段经历.....	
.....梁钧铤 (11)	
去延安.....	姚浩然 (21)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孙 燕 (2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回忆.....	张荪芬 (26)
中国的红十字会(节译)(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	
.....声涛、柘舟译 (28)	
附录：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	(36)
* * *	
在贵阳图云关的红会救护总队.....	薛庆煜 (38)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救护总队部.....	沈新路 (56)
参加红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回忆.....	林竞成 (64)
回忆图云关.....	施正信 (76)
荣独山教授谈红会救护总队.....	朱崇演 张建军 (84)
红会救护总队在贵阳.....	于怀卿 (89)
红会救护总队的组织简况.....	王化棠 (94)
在红会救护总队部的回忆.....	汪犹春 (101)
红会救护总队部的一些情况.....	余世法 (107)
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回忆.....	王春菁 (114)
我在贵阳图云关红会救护总队工作的经历.....	
.....利舜英著 施正信译 (122)	

抗战期间红十字会生活琐忆·····	陶天白(125)
救护总队部医疗队工作简介·····	王从炎(131)
红会救护工作拾遗·····	何 涛(134)

* * *

回忆我在红会医疗队的情景·····	许恩溥(139)
红会六十四医疗队情况·····	刘廷杰(142)
记六十四医疗队·····	吴宏宇(145)
我在红会救护总队的经历·····	徐 植(149)
救护工作四年·····	邓德草(154)
红会救护总队与卫训所的培训关系·····	姚仁里(156)
救护总队卫生材料总库工作简况·····	于怀卿(160)
参加红会工光队工作一点回忆·····	丁春华(164)
回忆贵阳陆军医院·····	杨锡寿(167)
难忘的岁月	

——记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医疗队在缅甸···汪犹春(177)

* * *

林可胜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卓越功绩·····	吕运明(187)
领导战时救护之林可胜先生·····	陈 韬(191)
回忆周寿恺主任·····	杨锡寿(199)

回忆抗战时期党在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

郭 绍 兴

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向国内各界、海外华侨及国际上广泛呼吁援助，举办战时医疗救护事业。一九三七年夏，曾在南京办了一个收容五千伤病员的“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医院”。这个医院主要是收治由淞沪战场上输送来的伤兵，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动员全国军政医疗卫生机构中一批医护人员及一批卫生人员，参加这个医院工作。当时，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中的郭绍兴、薛宁人等几位同志也在这个医院。郭绍兴担任环境卫生股股长，在中央卫生实验处环境卫生系过祖源主任指导下进行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会将“首都医院”就地疏散，主要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随红会迁到武汉。一九三八年在湖南长沙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在长沙合办“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短期医疗救护卫生训练后，编成医护卫生队（每队二十至三十人不等），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及民众的工作。当时，郭绍兴任救护总队部的视导员及卫生人员训练班的教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形势下，鉴于抗战的需要，由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公开出面，与中国

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队长、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主任林可胜博士（新加坡爱国华侨、生理学博士）建立关系。林赞成我党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我党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斗争。林可胜与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要求派人到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帮助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办事处叶剑英同志出面，介绍中共党员毛华强（又名毛维如）、冯骥（又名方纪）、黄群三同志，以非党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两个月毕业后编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58队。这个队是训练班的教导队，负责辅导学员学习。毛、冯、黄三人任生活指导员，在学员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每天“朝会”时作时事讲话；课余时间举办时事座谈会；开展歌咏活动，教唱抗战救亡歌曲。

一九三八年夏，党为了加强对救护总队的领导，在我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指示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以下简称红会支部），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郭绍兴任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党交给支部任务，公开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壮大我党力量；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药物资到解放区。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在林可胜博士的赞助和群众支持下，党支部的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不久，即发展了党员十余人，民先队员二十余人。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沦陷前，国民党中央命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及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由长沙后撤至桂林。从这时起，经徐特立同志与长沙市委决定，中共红会支

部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随救护总队部后撤。到桂林后，由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联络，在叶剑英、李涛、李克农等同志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救护总队部及卫生人员训练班又迁至贵阳图云关。二月，我先到达贵阳，持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吴奚如同志写的组织介绍信，按指定地址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几天后，我把当时红会支部的党员名单交给了袁，并将过去的工作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当时，救护总队所属医疗救护卫生队已发展到六十余个，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我党华北根据地太行、太岳及延安，也派有医疗队。卫生人员训练班已完成了为救护总队培训人员和组队任务，改组为军政部、内政部联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先后在陕西褒城（汉中地区）、福建邵武、湖北均县（老河口地区），成立三个分所。主要是轮训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和军医院的军医。这时红会支部党员已发展到二十多人，分散在湖南、桂林、救护总队运输部门、图云关总部和卫生训练总所。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同志借口医治胃病，住进图云关红会的医院。在他主持下，秘密召开了红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后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又名章文晋）为总支委员；下分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分别由郭、高、章三位同志兼任分支书记。关于党的工作任务，会议决定：（一）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博士，在卫生人员训练所设立组织科，并由高级教官、民主爱国人士马家骥任主任，毛华强、黄群、李壬炼（又名李普）、查立平等同志任教官。在学员

中进行政治教育，课程内容是《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二）利用运输股汽车在大后方来往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站”，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七十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主要是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的各种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及我党抗日主张，以争取群众。（三）在宣传教育基础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日战争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特别注意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药物资到我党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四）积极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上述各项工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一直进行到一九三九年底，虽在国民党的监视、干扰和破坏下，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我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红会大多数专家、学者、医务人员和职工普遍接受，从各方面不同程度地给我党以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先后动员了二十余个医疗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陆续组织和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进步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外国医生、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到我军工作；还陆续运送了大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医药器材到我党抗日根据地。如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他们携带约十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于一九三九年冬由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部出发，由林可胜博士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名义，委派驻西北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并帮助该团经宝鸡把物品运抵西安。再由郭绍兴秘密与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伍云甫处长联系，共同与巴吉尔团长商谈，并对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胡宗南及兵站少将卫

生处长姚典进行周旋，做了工作，使这批医药物资在几经周折后，大部运到延安。

在上述这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同志也在红会救护总队。一九三八年夏，她曾向中共长江局要求派党员去红会救护总队做教育工作。党派冯骥、毛华强和黄群三同志去红会，是和她的努力分不开的。武汉沦陷后，她以红会救护总队队员身份，奔波于新四军战地，救护伤员，帮助建立与健全伤兵医院。她还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药物资与捐款。在她的建议与支持下，红会救护总队派了两个医疗队去新四军战地做救护工作。

一九三九年夏，她在新四军防地到贵阳，在红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处找毛华强同志询问政治宣传情况，章宏道同志担任翻译，公开予我党以支持。史沫特莱同志热爱八路军、新四军，她在红会的这些活动，曾受到一些人的嫉恨，一九三八年底，红会救护总队在桂林时，她曾接到署名“铁血团”的恐吓信。对史沫特莱和当年在红会工作的其他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一九三九年冬，郭绍兴在党的指示下，接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委派，担任该总队第七十队队长，带队从贵阳出发，赴陕、晋、豫国民党第一、二、十三个战区做军队卫生工作。红会党总支领导工作，经袁超俊同志同意，先后由毛华强、高忻、章宏道三同志负责。

国民党对我党在贵阳图云关红会总部及卫训总所的活动早有注意，一九四〇年起，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例如：派中统女特务干扰破坏我们对红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派特务搜查红会运输股，抄走红会书报供应社发起人名单及一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刊，当场捕走汽车

队长张世恩同志（未暴露党员身份，后经林可胜博士保释）。一九四〇年又派中统特务到卫训总所建立“政治部”，将我地下党员主持的组织科撤销。另在陕西褒城、福建邵武、湖北均县三个分所设“政治指导员”。从总所到分所，建立国民党分党部，发展国民党员，大肆进行反共宣传。他们还决定将担任政治教官的我党毛华强同志送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此时，红会总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袁超俊同志的具体领导下，鉴于形势逐渐恶化，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停止公开活动，疏散党员。具体措施是：将集中在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部的一部分党员以总队名义，分别调到西北、华中、西南各救护队去工作；红会运输股各汽车队的一批清华大学学生党员，回到西南联合大学复学；政治面貌较“红”的卫训总所组织科的党员毛华强自行离职，秘密送往解放区工作；李壬练辞职，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查立平随组织科主任马家骥一同调往湖北卫训三分所工作。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红会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一九四二年初，郭绍兴在西北向红会救护总队辞去第七十队队长兼视导员的职务，到重庆利用社会关系，先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和行政院卫生署工作。这时，袁超俊同志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郭与他接上了组织关系。于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根据党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由袁超俊、郭绍兴同志共同负责，对原红会党员，除党的关系早已转出或个别与党失去联系或自动脱党的外，其余坚持党的立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十二名党员，经考察后重新登记，并将名单上报到南方局组织部。至此，红会党组织完成了它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

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 红会救护总队部

过祖源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理学教授林可胜辞去教职南下参加抗日，应卫生署聘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筹办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招收流亡青年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派赴抗日前线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工作。一九三八年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成立，并在长沙筹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后训练所搬迁祁阳，又在贵阳郊区图云关修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正式调训部队医务卫生人员。

我原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担任卫生工程组主任工程师。抗战初期，我随院由南京迁汉口，后调长沙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担任卫生工程学组主任。后又随训练所经祁阳到贵阳，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卫生工程指导员。在贵阳时，我除办理土建工程和训练学员工作外，还曾会同训练所防疫学组主任医师施正信赴西安、延安、洛阳等地区西北战线视察红十字会救护队环境卫生防疫和灭虱淋浴治疥站工作。一九四一年初，林可胜教授专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兼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长，卫生署另调朱章虞医师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长，在重庆·歌乐山修建新院，我才脱离红十字学会由贵阳调回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

一九四〇年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部时，我和施正信医师，随同林可胜总队长在现场介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在后方受训和前方办理救护医疗卫生工作，包括卫生防疫、环境卫生和灭虱淋浴治疗站等工作。

冯将军看了卫训所环境卫生组安排的一些野战区环境卫生设施如饮水消毒，钻空厕所，简易灭虱器等，并问了当前士兵们患些什么病，那些卫生问题比较严重，我们就根据红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将军汇报了一些医生情况。当时军医院住的士兵大多是病兵多而伤兵少。病兵中最多见的是痢疾、腹泻、伤寒等肠胃传染病。它们是所谓污秽传染病，传染病的细菌污染了饮水、食物而致病。其次是斑疹伤寒，是由虱子传染的，尤其在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个人卫生差，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而传播此病。谈到虱子与斑疹伤寒的事我们向冯将军介绍了虱子对历史起的作用。据西方历史的记载，十八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欧洲战争，包括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在内，不遭受这虱子与斑疹伤寒的影响的。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1918)，斑疹伤寒在东线战场十分猖獗，很长一段时期阻止了三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冯将军细听了我们讲的史实很感兴趣。所以他对红会的“灭虱、洗澡、治疗”的计划，对于简易灭虱器(木板制的、可以拆开而搬运的)的操作施用加以细致的检查和详尽的询问。过祖源在汇报驻地环境卫生方面着重说明(1)要保护饮用水源卫生，加强水质处理，改良水井和抽水设备，重视饮水消毒(2)要修建厕所妥善处理利用粪便和污水(3)要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防止蚊蝇滋生(4)要修建灭虱淋浴治疗站，防治传染疾病，加强卫生保健。视察完毕后冯将军还

(下转20页)

抗战时期我在“红会” 医疗队的一段经历

梁钧铤

我原是上海的一名女工，“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一九三六年参加“三八”妇女节的集会中，听了关于抗日救国的演讲，使我认识到，退让改变不了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会后，我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大游行，并加入了“救国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爆发淞沪抗日战争，使我全家尝到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我们只好到难民所栖身，混一口饭吃。大约到了十月间，我和胞姐梁洁莲在上海红十字会十九救护医院当了助理护士，日夜看护从抗日前线运来的伤兵，亲眼看到很多伤员到达医院时因流血过多死在担架上。这使我认识到“救死扶伤”的意义和人活着的价值。我还听说，八路军坚持抗战，英勇杀敌，但又少医缺药，因此我很想去延安或北上抗日，为八路军服务。当时，十九医院的事务员孟燕堂向各界进步人士募捐到一批医药器材，并组织一些医务人员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医疗小组，准备去为八路军服务。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孟燕堂（领队）、马仁源医师、戴婉芝护士、谢丽华助产士、梁洁莲助理护士、梁钧铤助理护士、福奇事务员、朱文奎事务员等。

我们医疗小组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浙江宁波龙华寺，先